

東江水的故事憶記



中央電視台播放關於自1963年以來東江水供應香港的歷史，中共中央宣傳部同時嘉獎當年參加東深供水工程建設者群體，授予他們「時代楷模」稱號。我們作為經歷過那一段近六十年日子的一代人，就深有感受，也對祖國的關懷充滿感恩之情。東深供水工程建

於國家困難時期，與剛建成不久的港珠澳大橋分別成為香港與祖國血肉相連的象徵工程！回顧香港過去兩百年的發展，一直是與內地緊密聯繫，有着休戚與共、血肉相連的恩情。歷史告訴我們，有祖國的強大支持，我們毫無後顧之憂！

劉佩瓊 原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人口迅速增長，食水供應就靠水塘儲存的引水道匯集的溪澗水及雨水，缺水的情況愈來愈嚴重。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當時經營國貨貿易的中國商人便想到向廣東「買水」。也嘗試以輪船運水，然而對於當時350萬香港人口而言，只是「杯水車薪」！總要想出一個長遠之計。香港有些人就想到一個破天荒的大工程，引內地的水來港。

周總理決定撥專款向香港供水

當時中國經濟仍在三年困難時期，港英政府與中國政府間也沒有溝通渠道。當時香港日常生活所需都是依賴內地供應，內地與香港的貿易額佔總貿易額的50%以上，主要是牲畜蔬菜、生活用品等等，有十多間大規模經營國貨的公司，大量批發商號。可以說，當時國家就對香港同胞照顧得無微不至。當時國家仍值饑荒，香港有人建議內地向香港供水。廣東省領導趁周恩來總理外訪非洲回國停廣州飛機加油

時，把他留在廣州住一晚，向周恩來總理報告香港的情況。周總理決定支持，在對外援助專款中撥出3,800萬元人民幣，並集中調撥大量人力物力參與建設，才解決了難題。

但是如何進行與港英政府的合作呢？那就需要中間人在港英政府與中國政府之間建立溝通渠道。那個人就是利銘澤。

利銘澤在港英當局眼中是華人代表。而利銘澤個人交遊廣闊，與各路人馬均建立很好的關係，因此成為最佳中間人。在利銘澤的努力下，港英政府接受內地供水的建議。而香港中華總商會等經營國貨為主的商人則取得中央人民政府及廣東省的支持，在周總理直接關注下，開展東江供水香港的大工程。

東江水來自江西，匯流於廣東省河源市萬綠湖（新豐江水庫），工程由惠州起建封閉管道輸水到深圳水庫，再輸給香港，以避免受東莞、深圳水道污染，而由於地勢漸高，要建多個抽水站，因此有「讓高山低頭，令河水倒流」的口號。當

時中央政府是打算免費供水，但是香港方面認為不好，只象徵式收取一元水費。

東江水工程完成後，香港市民就再沒有受缺水之苦。當時有一部紀錄片：《東江之水越山來》在電影院放映，很多香港人都看過。

利銘澤架溝通渠道成功建工程

利銘澤也一直維持聯繫中國政府駐港機構與港英政府、香港政商界的責任。每年春節，他會在利園酒店設春茗，招待規模很小的一批客人。那就是中英最早的溝通渠道。

利銘澤於1983年辭退，他是最早響應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的企業家之一。廣州花園酒店就是他牽頭集資籌建的。他去世後，擔子就落在其夫人利黃瑤瑤的身上。我由於受利太所託，參與1985年花園酒店財務危機的處理，也有幸參加了幾年春茗，受邀到會的都是大人物如包玉剛等。利太十分用心安排，菜單是她定的，而且事前試吃。這個飯局維持到九十年代

初，利太宣告退休才停止了。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視察東江水兩次。我也寫了很詳細的視察報告。報告主要關注水污染處理，沿河各市縣經濟發展受限制，如何提供生態補償和經濟補償問題。當時，我也建議用河域管理，解決污染及浪費的界外效果問題。也了解到當時實施管理的困難。可以說是今天我很多河流採用「河长制」的濫觴。

中共中央宣傳部授予東深工程建設者群體「時代楷模」稱號。我們香港同胞更應該銘記及感恩。東深供水工程建於國家困難時期，與剛建成不久的港珠澳大橋分別成為香港與祖國血肉相連的象徵工程！

回顧香港過去兩百年的發展，一直是與內地緊密聯繫，有着休戚與共、血肉相連的恩情。歷史告訴我們，有祖國的強大支持，我們毫無後顧之憂！祖國對香港一直關懷備至，我們相信不論遇到什麼困難，我們都能在國家的支持下安然渡過！

完善選制為香港科技創新注入活力

黃錦輝 教授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首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主題講座中講者多次提及到網絡及科技安全的重要性，筆者作為資訊及通訊科技（ICT）業界人士，非常認同這觀點。筆者於1996年和多位資訊及通訊科技界內資深人士和專業團體一起努力，成功向當時臨時立法會和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爭取成立立法會資訊科技功能組別。

很可惜，自回歸以來資訊科技界的選舉委員會委員和立法會議員的席位，大多數都成政客的囊中物，專業人士卻被拒諸門外。政客更肆無忌憚地利用這些政治平台來阻撓政府施政，嚴重延宕香港發展。他們居心叵測，顯然非愛國之輩。政客能夠佔據資訊科技功能組別的主要原因是選舉制度的漏洞。今次政府提出「修訂」，改善上述資訊科技功能組別選舉的不足之處。

首先，政府的條例草案把科技覆蓋範圍擴大，由「資訊科技」擴展為「科技創新」，當中除了資訊之外也覆蓋生物及其他物理科技範疇。科技創新是國家「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重點發展領域，是次改動反映出國家對香港的科技創新能力之重視，期望香港能夠發揮其科創能力，更積極參與國家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與此同時，香港也要加入維護國家安全團隊，做好科技安全工作。

第二是選舉方法的改善。選委會內科技創新界

設有30席，一半是由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香港院士提名產生，另一半是由合資格團體選民選出。後者的做法是團體負責制，比起以前由個人選民選出的做法能更有效地選賢任能，原因是這些專業團體對參選者的專業能力及經驗均了如指掌，而並非依靠「誰大誰惡誰正確」的不專業手段選出來。

第三是覆蓋的領域甚廣。合資格團體的組成分為三大部分：（一）國家級科研平台；（二）與創新科技發展密切相關的公營機構；及（三）參與政府科創發展諮詢的學術組織和專業團體。宏觀而言，透過具備廣泛覆蓋性的委員會，他們肩負起建議和監督香港政府在科技創新發展的重責，包括與內地科研機構協作，開拓內地特別是大灣區市場；透過香港不同的應用研究中心及科創基礎設施，促進香港科技轉移及科研商業化工作；深化官、產、學、研溝通及合作，讓政府多了解香港科創產業的需求等。

政府的修例建議更能選賢任能，為香港選出一批既愛國又專業，能為香港及國家作出貢獻的科技創新人才。筆者期望新一屆選委、立法會議員及特首可以將香港盡快拉回正軌，積極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協同發展，並按「十四五」規劃打造香港特區成為國家的「國際創新及科技中心」。

澳大利亞撕毀「一帶一路」協議非常愚蠢

馬煦 國際資深媒體人

澳大利亞在反華的道路上越走越遠。4月21日，澳聯邦政府宣稱，根據該國2020年通過的《對外關係法案》，已經取消與維多利亞州與中國簽署的兩項有關「一帶一路」合作的協議。這是澳大利亞在對華關係中製造的又一起嚴重事件，將嚴重影響中澳關係，直接傷及澳大利亞企業和民眾的切身利益。

澳大利亞當局這樣做，在國際上是一種背信棄義，損害的不僅是維多利亞州的正常對外交流合作，而且是澳大利亞的國際聲譽和國際形象。

策應美國反華圍堵戰略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合作協議是光明正大的事，雖是澳地方州的行為，但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當時及後來不可能不知情和未批准。澳大利亞對於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共商共建，一度是持認同態度的，維多利亞州政府更是一直對「一帶一路」協議持有正面評價，認為簽訂「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協議，將會有力促進來自中國的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能保證和增加當地的就業。現在莫里森政府反悔，主要是因為國際和地區的對華關係風向出現了一些惡劣的變化，其編造的理由純屬騙人的鬼話。

澳大利亞當局這樣做，是針對中國處心積慮的陰謀。中國與澳大利亞，在過去很多年裏發展了廣泛深入的互利共贏合作，包括經貿、教育、旅遊、文化等多個方面，澳大利亞是這種合作的主要受益方。但近年來澳大利亞政府卻忽視中澳關係大局，在一系列問題上不斷採取嚴重傷害中國和中國人民感情的錯誤做法，導致中澳關係嚴重滑坡後退，遭到中方的嚴正警告和反制。但澳大利亞當局仍執迷不悟，試圖以所謂強硬和執著逼

迫中國讓步。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澳當局在去年竭力推動澳大利亞國會通過了所謂的《外國關係法》，這是針對中國的政治操弄，目的是阻撓澳大利亞地方州與中國的正當交流合作，迎合澳國內一些反華勢力的叫囂。

澳大利亞當局這樣做，是在策應美國的反華圍堵戰略。澳大利亞出於自身利益考慮，對於中美爭端本來是比較超脫的，中澳關係也在很長時間裏保持了平穩發展。2015年中國和澳大利亞簽署了《中澳自貿協定》，兩國給予對方最惠國待遇，澳大利亞的乳製品、牛肉、海鮮、酒水等產品，以及煤、銅、鎳等礦產資源以優惠條件大量出口到了中國。可後來的澳大利亞政府卻昏了頭，迷了路，與美國特朗普政府勾結在一起，充當美國的幫兇。拜登上任後基本延續了特朗普對華極端政策，莫里森政府亦步亦趨，盲目追隨。

惡劣反華將付出慘重代價

最近以來，華盛頓當局竭力推進印太戰略、強化美日印澳「四方聯盟」和「五眼聯盟」，企圖構築國際和地區反華戰略同盟。澳當局又一次衝鋒在前。莫里森政府宣布取消維多利亞州與中國的合作協議，很大程度上是故意做給美國看的，為的博得美國主子的歡心，配合美國破壞「一帶一路」。

但澳方口口聲聲說希望與中國開展交流合作，甚至在此次宣布取消維多利亞州「一帶一路」合作協議時仍假惺惺地稱不針對特定國家，但澳當局卻總是在說一套做一套，陰一套陽一套，自以為聰明，其實非常愚蠢。

澳大利亞當局必須明白，其倒行逆施和惡劣反華是要付出慘重代價的。如果不立即撤銷錯誤決定，中方必將堅決有力地回擊！

江樂士

4月16日，有9名知名被告人因涉嫌參與2019年8月18日的未經批准集結而被判處8至18個月監禁，其中的李柱銘、何俊仁及吳靄儀三人獲判緩刑。案中有兩名被告認罪，所有人均被判組織或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有些人更背負雙重控罪。

被告質疑控罪不當，法官胡雅文在判刑時反駁了他們的辯護，指出基本法雖然保障集會和言論自由，但這些權利並非絕對的。她指出：終審法院在2005年裁定把非法集會定性為犯罪活動乃合乎憲法精神並為此建立通報機制，所以這些被告不能以任何理由為自己開脫罪責。法官指出，被告舉辦及參與的遊行嚴重擾亂交通秩序，規模之大足以演變成暴力事件。

案中二名被告黎智英、李卓人和不涉及本案的楊森承認於2019年8月31日在灣仔參與另一場未經批准集結並認罪。當時有2,000多人無視警方禁令，由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中環聖約翰座堂。胡官在宣判時稱，有影響力的人能號召大量民眾聚集，因此極有可能會觸發暴力事件。但這項控罪比先前提及的較輕，因此監禁刑期明顯較短，由6至8個月不等。

根據《公安條例》第245章第17A節，非法集會乃嚴重罪行，最高可判處5年監禁。雖然有人質疑胡官判刑過重，但上訴法院曾經明確表示，在這種情況下，所有法院都應率先考慮現有的最高刑罰作為量刑準則。換句話說，立法機關定立最高刑罰時已體認到罪行的嚴重性，故此，法院應據此量刑。由此可見，考慮到胡官可判

處的最高刑罰高得多，她的量刑已經非常寬鬆。

警方完全有理由不批准某些集會活動，例如可能會引發暴力、威脅公共安全或引發交通混亂的活動。這個已是世界公認的原則。美國的大城市限制公眾集會的情況屢見不鮮。在紐約，市民如果在公共街道上遊行、或在公園裏舉行超過20人的活動、或者在公共場所使用擴音設備，都需要事先獲得警方許可。有鑑於此，美國駐港總領事漢史墨客安稱「案中各人因出席和平集會而被判有罪，這種情況令人極度擔憂」，他無疑是在干預香港司法事務，其雙標和虛偽令人不齒。

美、英、加、德、法、荷、瑞士和歐盟的外交官都出席觀察本案的宣判過程，希望他們已經如實向上司報告了本案法官的公平審判和量刑情況。若他們如實報告，但上司卻根據政治目的來評論案件，顯然沒有依據報告的內容，可見，這些實況報告算是白做了。

這種情況並非僅限於此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就曾無視證據確鑿而妄稱「818案」為政治檢控，還要求釋放所謂「因行使基本權利而遭到拘禁者」。這種言論簡直是對法治的粗暴踐踏。香港法庭依法公平審理，不聽命於任何勢力，美國及布林肯等妄圖干預、徒勞無功。香港司法界不偏不倚，表現在亞太區位列前茅，實為港人之幸。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版原文發表在英文《中國日報》，有刪節。）

朱浴龍 安徽省政協常委 香港東區各界協會會長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處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在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賦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新的重大使命。

從「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來看，國家不僅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形成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更進一步強調要以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為重點，提升創新策源能力和全球資源配置能力，加快打造引領高質量發展的第一梯隊。更為重要的是，聚焦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十四五」規劃綱要草案首先明確，要加強粵港澳產研協同發展，推進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便利創新要素跨境流動。

正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科技創新，不同城市要發揮科研、市場、製造、融資等方面的優勢，香港要與大灣區城市實現「併船出海」，共同促進科技創新的要素流通，讓人流、資金流、數據流等都流通起來，並爭取更多科研人才落戶大灣區。

大灣區為試點，率先探索建立突破行政區劃的開放型高標準創新市場，建立投入與收益相一致的創新成果利益分享機制等，從而讓創新要素在粵港澳大灣區「9+2」個城市之間順暢流動，吸引全球創新要素集聚。

要加快通過完善創新協同合作體制機制，推進跨境資金自由流動，構建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生活圈等，全方位支持實現科技創新要素在粵港澳大灣區自由流動，包括要加快構建大灣區人才、資金、技術、信息、貨物等資源高效流通機制，推進大灣區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和跨境金融資產交易平台建設等，將灣區教育、科研、產業、金融、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優勢很好融合起來，形成緊密創新共同體。

「內融外通」和「併船出海」，將引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邁上新台階。通過推動大灣區內部創新資源向內集聚，吸引全球創新資源向粵港澳集聚，在自主創新、基礎創新和原始創新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並以技術創新推動產業創新，在各領域形成自主創新能力，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示範區。

大灣區「內融外通」「併船出海」